

全球族

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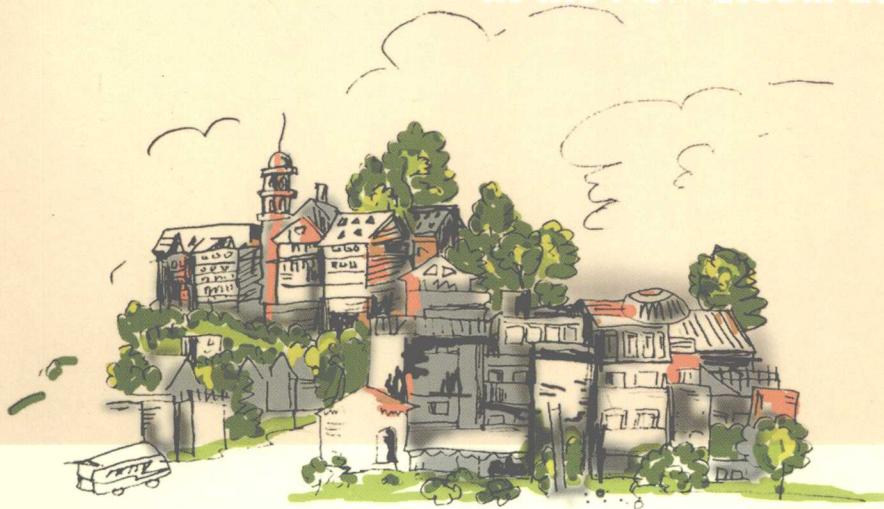
〔美〕乔尔·科特金/著

(Joel Kotkin)

王 旭 等/译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全球族

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

〔美〕乔尔·科特金/著

(Joel Kotkin)

王 旭 等/译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 / (美) 科特金著；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
(城市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0924 - 5

I. 全… II. ①科… ②王… III. 社会人类学－研究
IV. C91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9941 号

· 城市译丛 ·

全球族

——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

著 者 / [美] 乔尔·科特金
译 者 / 王 旭 等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 子 信 箱 / bianyibu@ssap.cn

项 目 负 责 人 / 祝得彬

责 任 编 辑 / 陶盈竹 李建红

责 任 校 对 / 刘佳雨

责 任 印 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7.6 字 数 / 27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924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7 - 0453 号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07 - 0453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Joel Kotkin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Copyright © 1992 by Joel Kotki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兰登书屋 1992 年版本译出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圣经·箴言》22:29

译者前言

所谓部族（tribes），一般指历史上于部落之后、民族形成之前存在的具有不甚稳定的共同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等共性特征的族群。在部族形成过程中，人们的血缘联系逐渐为地域联系所取代，并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产生了自己属于某一部族的共同意识。后来国家的形成促进了部族的巩固，部族发展成为民族。而在本书中，作者乔尔·科特金对“部族”一词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并发现了新的价值。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传统的地域疆界、国家和民族的束缚时，部族的某些特征仍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延展、相互促进。不过，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地域联系淡化了，代之以宗教与族裔及文化传统的联系。因此，族群意识可以视为全球经济演进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弘扬部族这些新特征方面，有一些民族是非常成功的，其中以科特金着力探讨的五个主要群体，即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最为突出。虽然这五个群体各自历史差异巨大，但他们具有强烈的族裔认同感和共同依存的意识，这使这些群体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变化中从善如流，而不是失去自身的基本凝聚力。他们表面上似乎是分散而居的，但他们的网络遍布全球，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部族，特别适宜在今天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范围经济体系中获得成功。随着传统

的民族、国家以及区域的屏障在全球经济力量的重压之下越来越淡化，可能这些分散的全球化族群——以及他们遍及世界的商业与文化网络——将日益左右人类经济的命运。

本书作者乔尔·科特金，是“新美国基金会”欧文高级研究员，也是《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杂志》、《美国企业界》和《洛杉矶时报》等名牌媒体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在未来学、民族学和城市问题等研究领域受到各国广泛关注，颇具权威性。其著作往往甫一面世，即成经典书热卖。在其发表的六部著作中，《全球族》和《新地理》深受学术界推崇，好评如潮，已奠定其经典的地位。后来于2005年出版的《全球城市史》也格外抢眼，互联网上和各类媒体的评论几乎铺天盖地，完全也有望成为经典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慧眼识珠，在该书英文版刚刚问世之时，就委托我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出版，此书成为学术类畅销书，一度传为我国出版界的佳话。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把《全球族》的中文版奉献给我国读者。本书高屋建瓴，对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有清晰的把握，同时又有非常有说服力的典型个案分析，值得细细品读。作为翻译者同时也是最早的读者之一，我深感荣幸。

当然，作者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和表述略显偏颇，值得商榷，但为保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和观点的统一，在翻译时仍保留原貌，相信读者自可辨别。有些人名、事件等，可能有多种译法，因此凡有此类情况均附原文。

本书各章翻译人员如下：王旭（前言和鸣谢部分等），李莉（第1、2、3章），王田（第4、5章），苏宁（第6、7、8章和结语）。全书由王旭统一校阅。

王 旭

2007年9月于厦门大学

鸣 谢

这三年来我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这本书上了。完成这个项目需要大量非同寻常的研究和实地考察，这就要有形式各异但持之以恒的智力和经济上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在此方面，我非常幸运地得到如此多人发自内心和富有成效的帮助。

一般而言，开列此类鸣谢名单时不宜过于突出某一个人，但是本书要打破这个惯例。对组建“部族”贡献最大的是我的研究员，也是我的好友哈尔·普洛特金。撰写此书所涉及的大量研究都有赖于哈尔广博的知识和对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资料娴熟的使用。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哈尔也得到了两个学生朱莉耶·秦和毛伟顺的帮助，他们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高超的工作能力，有助于此书按时完成。哈尔还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访谈，同时提供了对本书构思至关重要而又令人信服的批评。

在对这项研究进行构思并把它变成文字的过程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两名出色的编辑的帮助。还是在草稿阶段，马克·贝纳姆就开始了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字斟句酌，对于本书稿文字质量的帮助比任何人都大。另一个人是兰登书屋的执行总编安·戈德夫，我从他那里也不断得到鼓励和指导。

感谢我的研究助手有助真里所提供的始终如一的帮助。除了

使我的书稿免于付之一炬或不致使我窒息外，她还在文献翻译和几次赴日旅行方面提供了无法衡量的帮助。她的忠告，特别是有关她的母国年轻人方面的忠告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是很有帮助的。

本项目如果没有两个主要机构的稳定支持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两个机构是设在丹佛的思想库“新西部研究中心”以及加州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商务与管理学院。这两个机构都支持我对《全球族》的研究和撰写，没有它们的帮助，本书无法付梓。感谢“新西部研究中心”的菲尔·伯吉斯博士和肯特·布里格斯，他们给我提供了研究和精神上的支持，感谢佩珀代因大学同事们的帮助，特别是詹姆斯·威尔伯恩博士、约翰·尼克斯博士和基思·麦克法兰。

还有几个机构鼎力支持我的工作，也值得提及。在台湾，我从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得到资助，得以在那个经常被忽略但又日益重要的地方从事研究。感谢位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托克维尔研究所在关于移民政策和影响的研究工作上的财政支持和行政管理。最后，我想向几位编辑表示我的谢意，他们是前《加利福尼亚》杂志、现BUZZ杂志的格雷格·克莱泽，《新视角》的编辑内森·加德尔，《华盛顿邮报》的朱迪·艾伦，《公司》杂志的乔治·吉德隆，《洛杉矶时报》的加里·施皮克和艾利森·西尔弗，以及《家政》的史蒂夫·所罗门，他们对本书的研究给予了各尽所能的支持。

由于本书的选题很独特且难度很大，因此非常有必要征询某些具有特定族群知识的人的意见。关于犹太人的章节，我特别要感谢卡特里尔·斯库里和诺米·本内森以及他们在特拉维夫贝尔博制片厂的员工们，也感谢雷切尔·佩里斯科在研究方面出色的工作。在法国，我特别受惠于Consistoire de Paris的利昂·马斯利

亚的见解以及和他的很多联络。在我家附近，加州圣莫尼卡的公理会（Kehillat Ma'Arav）的拉比·梅尔·戈特利布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有关犹太人的章节，以其挑剔的眼光在我学术味很浓的分析中找出问题。

关于英国的章节有赖于普华国家会计公司的杰里米·戴维斯以及这个受人尊敬的组织的世界网络的帮助。我也得到了曾就职于渣打银行洛杉矶和香港分部、现在伦敦总部工作的杜格·贝克特的帮助。我还从英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得到支持，特别是安格斯·麦凯。通过他们颇有效率的工作，我很愉快地与他们在伦敦以及爱丁堡的职员们协作，那里的每一个办公室都为我安排了无数的面谈和无法估价的实际帮助。我也从《理性》杂志编辑弗吉尼亚·波斯特雷尔那里接受尖刻的分析，尤其是关于基督新教的；从南加州技术执行网络公司总裁罗伯特·凯利那里聆听他关于英美商业文化的高见。

在欧洲，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很多友善而博学的人的帮助。我在法国的研究工作得到洛杉矶领事的大力协助，其中包括总领事杰勒德·科斯特和新闻文化处专员玛丽·特文宁。在巴黎，弗朗斯·拉圭提供了无法估量的行政帮助以及很多有价值的看法。在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为我提供了到这个神奇的国度访问 10 天的安排，这对于我理解现在塑造欧洲活力的很多方面是有益的。我也感谢德克·格罗斯-利格所做的有深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移民和人口统计方面。

苏联的学者们也在我的研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要感谢两位非常年轻的俄罗斯人，企业家弗拉基米尔·西多罗夫和《新时代》杂志记者列弗·耶里林，他们在我去莫斯科及其周边旅行时做翻译并提供基本路线图。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绝不会得到这个国家如此热情的欢迎和理解，当年我的祖父母就是从该国移民出

来的。

在我多年对经济领域变化进行分析时，日本的作用无疑是很关键的。我几乎一如既往地完全依赖对德山次郎和鹤龟亚纪这两位我多年的“先生”的咨询。我也很感谢日本对外贸易组织的平野志好和早濑正敏，福冈科技大学的尾平秀雄教授，法政大学清成忠男教授、法政大学电通人类研究所所长谷昭的帮助。

感谢索尼公司的和田宪治、八佰伴公司的和田一夫，他们不仅帮助我们安排很多与他们在日本的同事的访谈，也安排我们对其远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事进行访谈。我也感激戴维·弗里德曼博士仔细阅读本书初稿，他是令人尊敬的朋友，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日本问题研究员，长驻洛杉矶。最后，我的日本代理人汤姆·玛丽和海美代子，以及我的扶桑社的出版商，特别是松井洋一对我在那里的研究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

在有关中国的章节中，我最想提到的是我的朋友、《中国时报》驻洛杉矶记者文森特·刁和他的台北的《世界杂志》的助手。我也得到了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的莉莉·陈和科万顿·陆的帮助。在香港，我要感谢港府新闻署的职员们，在该署驻旧金山办公室的彼得·约翰逊和梅林达·帕森斯的推动下，在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性大都市充满活力的中心数星期的研究中他们起了莫大的作用。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我所论及的所有主要部族中，我对亚洲印度的了解可能是最差的。但是这个局面被我在美国的很多印度朋友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向我提供了世界范围的网络联系。我特别想感谢洛杉矶的米拉·艾德瓦尼，她安排了我在英国和东南亚以及美国本土的很多次访谈。她帮助我安排的去印度的旅行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她的家庭和朋友们所展示的友情，至今依然是我难忘的经历。我也想向旧金山金融家尼汀·梅赫达和

硅谷印度专业人士联合会主席普拉喀什·昌德拉表示我的感激，感谢他们的观点和他们对我与世界各地印度人联络中的帮助。

我还想向另外几个人表达谢意，感谢维克托·保罗·艾杰罗尼在我与巴勒斯坦人社区的联络中提供的帮助，感谢洛杉矶的保罗·艾金所提供的全球亚美尼亚人的网络组织的帮助，感谢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的基思·阿特金森和唐纳德·利菲弗。

就是这样一个长长的感激名单也很难保证不漏掉很多在此项目中帮助过我的人。但在这个长期研究即将大功告成之时，我要把最重要的感激留给与我共事时间最长、共同从事过其他很多研究项目的人，尤其是我的代理人梅兰尼·杰克逊，以及我的出版商杰奎琳·格林。在此方面，我也要感谢马克·科特金读完本书初稿所提出的有见地的看法，以及我太太朱莉·科特金、我母亲洛雷塔·科特金，照顾我的饮食起居，陪伴我度过这段艰辛的历程。没有我的家庭，我可能会在此书撰写的过程中多次打退堂鼓，有时我确实感到很迷茫，似乎撰写这本书是一条没有路标的道路，不知通向何方。

序 言

全球化的部族

进入 20 世纪时，人们沉浸在理性普及和世界一统的乐观情绪之中；然而，到 20 世纪行将结束时，人们的注意力转到种族、族群和宗教等问题上，淡忘了很早就有人预言的普世或历史终结论调。对于某些特定族群的精神遗产的需求再次为人们所重视，这种趋势将塑造新的世纪。用社会学家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Isaacs）的话来说：“自然科学发展了，知识增长了，自然界被掌控了，但理性并未占据绝对优势，部族属性并未消逝。”

对于许多文明社会的人来讲，这个趋势代表了一种向正宗的原始部族时代的回归。宗教和族群意识的日益增长通常反映在伊斯兰激进派、苏联集团的分裂，或者是美国洛杉矶之类城市的种族冲突之中，这些现象的日益增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而也提示我们，人类可能会分裂成狭小的、排他的、有时相互敌对的群体。

但是在这种看法之外，还有另一种部族主义的崛起，一种由分散在全球的族群所构成的部族主义。这些全球化的部族在今天已具有典型的世界性特征，与原有的那种独处一隅的地方化部族形成鲜明的对照。随着传统的民族、国家以及区域的屏障在全球经济力量的重压之下越来越淡化，可能这些分散的全球化族

群以及他们遍及世界的商业与文化网络将日益左右人类经济的命运。

部族的最基本的特点，是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有共同的价值观的族群意识。现在，全球化部族把这种意识与其在现代世界中成功的两个关键因素结合起来，即地理上的扩散和对科学进步的不懈追求。从以往的犹太人和英国人到今天地位日益上升的亚洲全球化部族之类的世界性族群，他们并未在科技的祭坛面前拱手交让他们特定族群的意识，而是利用他们历史上已习惯的价值和信念来成功地应对变革。

苏联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彰显了全球化部族的发展前景。世界各国再度萌发了对部族历史形象的兴趣。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佛教寺庙以及家庭神龛像雨后春笋一样，在苏联的所有地方都恢复起来了。其他的国家意识标识诸如俄罗斯的三色旗，都已经展示为大众认同再生的标志。

这种惊人的历史回潮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族群意识可以被视为全球经济演进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消减，人们试图从其历史全程之中寻求规律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部族这样的分散的群体看上去特别适宜在今天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范围经济体系中获得成功。

在界定全球化部族时，我寻求考察五个主要的群体：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这些群体都强有力地演绎了上述现象。虽然这五个群体各自历史差异巨大，但他们具有以下三个关键的共性特点。

(1) 具有强烈的族裔认同感和共同依存的意识，这有助于该群体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变化中从善如流，而不是失去自身的基本凝聚力。

(2) 具有一个以共同信任为基础的全球网络，这种共同信任

使该群体能有效地发挥集体作用，超出了国家或区域的界限。

(3) 具有一种执著地从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源中获取技术和其他知识的能力，同时能开放地培植升华文化和发展科学，这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经济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五个群体都拥有上述特征。应该说，分散的族群，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了。他们发轫之初往往微不足道，但有些最终将其影响扩展到广袤的地域，在遥远地域上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在他们逝去后几百年，甚至他们自身的社会消亡后，仍然存在。例如，在古代西方，巴比伦人、埃及人、希腊人、腓尼基人、罗马人就发挥了这种关键的塑造作用。同样，古代美洲土著——中美洲的印加人、玛雅人、阿兹蒂克人，以及巨大的中华帝国和伊斯兰帝国都给他们那个时代的疆界以外的语言、宗教、习俗、建筑、农业、文化科学等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后来，在中世纪过后的几个世纪里，其他具有更强自我意识和执著知识追求的群体在全球经济中另辟蹊径强盛起来。意大利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德国人都把其文化和技术影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再后来，其他群体如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现代希腊人、古巴人、韩国人、依波人也穿越国家疆界扩散影响，往往具有潜在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所有这些群体，当然也包括其他群体，都可以说具有上述全球化部族的某些特点。但是为本书叙述方便起见，我选择集中探讨五个在当今世界强有力地展现其全球性部族主义影响的主要族群。例如，在起源于欧洲的部族中，我集中探讨盎格鲁—美利坚人，因为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力——在国际投资、跨国企业、文化和政治影响等方面都有反映，远比德国人、意大利人或法国人巨大，后几个群体尽管其经济或文化上拥有巨大能量，但

现在仅限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影响半径内。同样，我选择亚洲诸国的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当今世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更因为他们对下一个世纪历史进程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我并不打算论证，也不相信这些群体的基本道德或其种族本身有什么超越其他种族的优越之处。在分析每一个族群时，他们作为全球化部族的发展都是通过与其他文明密切的接触和交往，获得文化上的跨越，而不是孤芳自赏地保持种族纯洁。事实上，全球化部族如英国人或日本人都是最卓越的模仿者，这是显而易见并得到世人公认的。同样，犹太人、英国人、印度人也远不是纯而又纯的仅限于某一特定天才的种族，他们自身在种族上是多样化的。

当然，命运这个历史的主要动力，在把全球化部族的角色分派给这些群体，后来又推动他们扮演好这些角色时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点在犹太人即我的本族方面表现得极其鲜明而强烈。犹太人在很多方面都可看成是代表全球化部族的原型。从亚伯拉罕时代起——或者可以上溯到神话时代，犹太人就已经因其历史独特性而卓尔不群，这种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和上帝有关。他们对自身信仰的坚持，既导致他们上千年在世界被迫流散，也更促使他们顽强保持其特定的属性。

由于其自身的社区孤立于陌生的并往往处于敌意的群体的包围中，犹太人不得已养成了强烈的自助传统，同时又拥有某种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特定技巧。在世界历史上，帝国兴衰更替，经济互有沉浮，庞大的宗教势力一浪一浪席卷各个大陆，但是犹太人的社会体制、历法和家庭传统都保持下来了。

作为一个散落的拥有广泛分布的社区网络的民族，犹太人在全球经济的早期就极大地受益了。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结束，